文化新闻部主办
责任编辑 赵卓菁 美编 张徐曼 校对 郝鹏飞 李静坤
运城日报

非遗印象

年华入画，终成繁花

“刻”出来的非遗：银盐相纸刻画

■本报记者 牛嘉荣

相纸，还能作画？

不用画笔，几把大小不一用手锯条磨制而成的刻刀，在手腕翻转下，一枝栩栩如生的荷花就绽放在漆黑的相纸上。这是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银盐相纸刻画带给人们的精彩。

在临猗县，有这样一位农民画家，他自小学画，承袭父辈技艺，从方寸小画到大尺幅作品，从业余爱好者到非遗传承人，从手艺人到守艺人，一“刻”便是数十年光阴。今年57岁的银盐相纸刻画市级非遗传承人荆胜利说，他的故事里，有银盐相纸刻画的“前世今生”，故事还在继续，传承从未停歇……

荆胜利银盐相纸刻画作品 常奇 摄

“原来在父亲手中，曾叫‘中国像刻’”

荆胜利的银盐相纸刻画，就是用刻刀在彩色相纸上刻出图画。他通过控制手腕力道的大小和锯条划刻的角度，将黑、红、黄、白4种颜色层层叠加，人物、动物、山水、花鸟在千万刀的细致刻画下，栩栩如生地出现在一张张相纸中。“这技艺，是和父亲荆管金学的。”荆胜利说，“真要追溯到它的发现时间，那得到我爷爷荆体英那辈了。”

1949年，荆体英从西安回到家乡临猗，为荆管金带来一张废相纸，相纸上有着好几层不同的颜色。这是荆体英在西安一照相馆当学徒修补相片时，意外用刀片划过相纸时发现的。相纸因受力不同，呈现出深浅不一的色彩，他也因此萌生出以此为载体、用刀片作笔绘画的想法。这一想法，被从小喜爱美术的荆管金发扬光大。

“父亲上世纪80年代在《运城拼音报》做插画师，闲暇时间常收集照相馆废弃的相纸进行刻画，刻着刻着就被领导发现，引起重视。”荆胜利回忆道，“后来在一次交流活动中，父亲创作的《关公风雨竹》被作为礼物，赠送给港澳同胞。”荆胜利介绍说，当年装有《关公风雨竹》的礼盒上，就赫然写着4个大字——“中国像刻”。

“原来在父亲手上，相纸作画曾叫‘中国像刻’。直到2020年，这一技艺被列入运城市第六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才第一次有了官方名称——银盐相纸刻画，我也有幸成为该项目的非遗传承人。”荆胜利说着，向记者展示了当年申请非遗项目时自己所准备的材料，那是一张从爷爷那里流传下来的老相纸、几件父亲使用过的刻画工具和自己无数卷的绘画作品……

“手艺人，本来是想随便画画”

1970年，7岁的荆胜利跟着父亲学习国画，他在父亲的指导下画人物、动物的骨骼，学习绘画世界中的事物构造。年岁渐长，他同父亲一样，格外喜爱画动物，钟情于颜料和画笔赋予画纸的生命力；紧接着，他开始画历史人物，沉浸用笔触跳动来感受多彩历史的全新体验。

“可以说，就是从小练就的绘画基本功，让我的‘相刻’之路走得更顺一些。”荆胜利回忆1989年第一次尝试银盐相纸刻画时的情形，关键词是“模仿”，模仿父亲的构思，模仿父亲的笔触，模仿父亲的技巧……“这样的模仿持续了20年，尽管其间我也努力进行自我创作，但相纸的尺寸还是限制了我的发挥，直到2009年，我的照相馆开业，事情才迎来了转机。”荆胜利继续说，“照相馆开业一年后，平时给馆里负责运送相纸的张老板意外看到了我用来练手的画作，好奇又惊喜，后便免费给我提供尺寸更大的相纸，也恰是这一契机，开启了我的银盐相纸刻画之路。”

尺寸巨大的相纸为荆胜利的“相刻”艺术之路注入新的活力。原先方寸大小的相纸所能承载的内容还是太少，不利于艺术的创作，相纸尺寸的加大，为荆胜利探索“相刻”的工笔画法提供了条件，更为他日后画作中工笔与写意相交融的意境提供了机遇。不过，荆胜利坦言，大尺幅画作所耗费的精力要远远大于之前，因此，“一人一案、一刀一画”成为荆胜利创作时的速写图景，他常常要在工作台上俯首刻上10个小时，光阴都凝固在他的一笔笔刀刻中。

“本来就是个手艺人，开始就是因为兴趣随便画画，谁承想变成事业了。”荆胜利笑着说道。画的尺幅大了起来，练习的机会也越来越多，逐渐形成了将国画、工笔画、油画、漆画融为一体的具有个人特色的绘画技艺。2016年，荆胜利将自己的照相馆正式转交给儿子经营，自己则一心沉醉在银盐相纸刻画的世界中。2020年，在第二届山西省文化创意设计大赛中，他的作品《文明之源》成功入围并展览。这一次，他把华夏之根刻进了相纸中，也推进了银盐相纸刻画的非遗传承之路。

“守艺人，要让非遗在传承中绽放华彩”

“从年节后，我就一直在为中国工艺美术产业发展大会设计大赛做准备。”荆胜利指着工作台上一幅未完成的《鱼跃龙门》说道，“这幅画采用Z型构图结构，大框架已经作完，现在就是对细节作进一步弥补，力求完美才能参赛嘛。”他一边说，一边用锯条在龙鳞上一刀刀刻着，仅仅十几刀，原本橘黄的鳞片在局部便呈现出了蛋白色。通过色彩对比和明暗构图，龙鳞的立体感瞬间凸显出来，更显灵动。荆胜利看似随意的每一刀，都是几十年功底的沉淀与绽放。

“这幅和我父亲的画法就有所不同了，父亲所画的花鸟更偏写意，有着国画的水墨飘逸之感，他刻下的颜色像是层层渲染下的荷花，在相纸中泛起了涟漪。我现在就融合了工笔和油画，并且没有按照他教给我的先勾线、再刻颜色的方法来作画了。”荆胜利说着，拿起一旁的废弃相纸给记者展示，“心中有大画，提前构图，然后直接用刻刀刻出颜色，依照色彩之间的对比‘勾勒’出形，再进行细节上的补充，也就是控制手腕力度，一层一层地把颜色叠加上去，以此营造出灵动感。”他手腕翻转，四五分钟后，一朵与他父亲截然不同的荷花跃然而生。

“除此之外，我发现‘相刻’中原有的暖色调在表现方式上有所欠缺，便使用锯条等类硬物摩擦相纸，形成擦色效果，以这种方式画云海、远山，别有一番意境。”荆胜利谈及自己数十年如一日对画作的探索时滔滔不绝，可谈到了如何传承时，他却略作了停顿。“这门技艺不练个十几年，很难学出来，人才不够，传承就是大问题啊。”荆胜利感叹道，“因此，我不仅教儿子、儿媳练习这一技艺，更教一些慕名求学的学生，就是为了能让更多的人了解、喜欢银盐相纸刻画。”

2020年10月，守艺人荆胜利带着银盐相纸刻画走进五老峰景区，让这一不过百年历史的非遗项目与游客近距离互动，以提升其影响力。荆胜利表示，在未来，希望能开展更多元的非遗技艺互动体验活动，让更多的人都能亲身感悟非遗的魅力，让静态的银盐相纸刻画走进人们的心灵。“从手艺人变成守艺人，更觉肩上担子沉重，只希望自己能够发光发热，让这项非遗能在传承中绽放华彩。”荆胜利说。

荆胜利的每一刀刻痕，赋予了寻常相纸不寻常的魅力，让黑色绽放出别样光彩，故事画在其间，倒像是刻下了他50年的岁月沉淀。

文化谈丛

非遗保护传承迎来新时代

■杜 桦

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在历史的发展中，一个地方居民的饮食习惯、服装特色、工具使用等，衍生出了多种多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当地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从非遗工作的角度来看，传承谱系、项目特点、历史发展是一个非遗项目的基本要求。非物质文化遗产能不能更好地适应快节奏的生活，既能实现价值又能带来长期收益？

传统“圈粉”在当代。在传统美术类和传统技艺类的项目中，一件非遗作品不只是精雕细琢，其中也蕴含着传承人的匠心与精神。在手工技艺类项目最多的新绛县和稷山县，当地的手工艺产品不只在省内红火，在省外也有很多客户。在前期的发展中，同行之间的竞争愈演愈烈，个别商家打起价格战，一些便宜的、制作不是很精细的产品陆续被生产出来。长此以往，个别手工艺品就变成了小商品，小商品无形中带来了这个行业的短暂性焦虑。毕竟在以手工艺闻名的古城绛州和稷山县都有它们标志性的手工艺品，例如，绛州澄泥砚，云雕，螺钿，金银细工等等，与它们相关的非遗产品一直以复杂的制作程序或原生态的大漆原料吸引客户。尊重传统，重视创新，遵循着慢工出细活的非遗传承人制作非遗产品，因为将精力放在了产品设计、市场拓展和更强的适用性上，他们生产出的非遗产品不仅被贴上了艺术品的标签，也受到了收藏爱好者的热捧，逐渐成为市场的热销产品，很多中青年人群的喜好也向这类型的传统靠拢，打价格战的产品这时大多没有了立足之地。

传统戏剧“热”当代。在运城的国家级非遗项目中，蒲州梆子、眉户、锣鼓杂戏、线腔都是当地的传统戏剧。目前，运城每个县（市、区）都有蒲剧团，临猗、芮城有专业的眉户剧团和线腔剧团。他们的每一场演出都是全体演职人员的集体发力，剧本经过无数次修改、演员练就童子功、导演反复指导和音乐创编、舞台设计等，这中间不止有汗水，还有所有人的敬业精神。帽翅功、椅子功、梢子功……在2021年运城旅游推介会上和2022年央视新年戏剧晚会上，折子戏《挂画》中的“金鸡独立”“魁星踢斗”“盘腿旋声”等椅子功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山西省蒲剧艺术院演出一团（运城市蒲剧团）从移植传统老剧目，再到排演新编历史剧《忠义千秋》和革命现代戏《党旗飘飘》，场场观众爆满，青年演员人才辈出，蒲剧发展前景良好。

非遗正在年轻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其传承人的实践活动为主要载体的，“活”的文化形态，确保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性。可以熟练掌握其传承的非遗项目，并在当地有一定的影响力是非遗传承人的基本条件。目前，我市的国家级、省级、市级、县级传承人数量已超千人。他们在传承的道路上持之以恒共同守护着这份事业。近几年，由于短视频的热播，青年一代的传承人将自家制作的非遗产品放在网络上直播展示和售卖。霸王鞭、绛州鼓乐、高跷走兽、高台花鼓等项目，也培养出了新一代的小学徒。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力量积极参与是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持续性保障。非遗是生活的华彩乐章，是人们的世代传承和与时俱进的文化精华。相信在新的时代，非遗的前景会更加灿烂。

为政之本在恤农

——《虞乡县强宜庵免减差徭记》启示

■祁 涛

工余闲暇之际，我认真学习了清同治十三年（1874）《虞乡县强宜庵免减差徭记》（原文见下文）碑文。该碑现存永济市博物馆。撰碑者阎敬铭从社会治乱、政权存亡的高度立论，通过对唐、宋以后及明、清时期赋役制度发展变化剖析和深刻探讨，生动、形象地歌颂了原虞乡知县强宜庵上任伊始，就大刀阔斧免减各项差徭、减轻当地农民负担的政绩，突出强调了“恤农为政事之本”的社会命题，在新时代的今天仍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碑为青石质，竖长方形，高、宽、厚分别为200厘米、76厘米、16厘米。碑身周边线刻4厘米宽的装饰花纹带，图案为牡丹、莲花配以瓶花，正文14行，满行68字，字径2.5厘米，楷书。碑文由时任工部右侍郎阎敬铭撰文，前知虞乡县事汪守正校阅，生员屈炎炳书丹。碑阴局部漫漶磨蚀。文分上下两部分：上部刊刻同治八年（1869）十一月三日乡绅士请求设立里民总局的报告及虞乡知县强宜庵的批示，共23行，行20字，字径2厘米；下部刊刻同治九年（1870）春虞乡知县强宜庵亲自厘定的车马、大差、杂差等供应章程，共17行，满行24字，字径3厘米。以上皆楷书，由张成德刊石，民国《虞乡县志》卷九收录有碑阳文。碑文的主要内容如下：

虞鄉縣強宜庵免減差徭記

天下有苦無複之而仍忠於事上者，其農民哉！不知其忠，遂不知其苦，不仁之甚者也。孟子言王政，首以不奪農時，寬其徭役，使天下知農之利、農之樂，而世於以治。今之農何如哉？力役之徵，古無論已。唐楊炎並租庸調為兩稅，丁口庸錢已歸入兩稅矣，而宋人複算丁以定役。前明萬曆中定條鞭法，舉一切無名雜征並之正供。是役法已入賦稅矣，而複出於常賦之外。古之所謂寬之者，宋與明皆增而加厲焉，而農民愈不堪命。我朝制度超軼往代，定制永不計丁，大兵大役雖資民力，定制仍准報銷。舉千古紛紜變更、歷無善策之役法，一舉而蕩滌之。聖朝仁恩周浹，唐虞之世，豈是過哉！而農民忠上之心，不以立有定制而易也。大兵供之，常役供之，凡無名之需無不供之。為長吏者視為固然，有加無已。天下之所以重困而變亂之出，乃以不可止。晉之虞鄉立縣，在雍正時。虞民之忠於上也，供億縣署食物器用車馬，其始無多，支應猶可為力。至鹹豐季年，費用滋繁，日甚一日。虞民之供於縣者，歲需白金一萬數千兩，而協助永濟縣車馬不與焉。以僻在山陬蕞爾，僅在二萬數千兩。地不當孔道，大兵大役之所不經，役之重繁，亦罕見鮮聞者。己巳之秋，溧水強宜庵邑侯來權虞篆，下車之始，恤民力已竭，且慮歷久召亂也，擇其甚害者免之減之，著為定章。視往者歷歲之用，省且強半。邑侯之心，不誠知恤農為政事之本哉？餘負疾避寇，力耕中條山下。年來歲穀不登，日循隴畝，目睹虞民賣妻鬻子，泣涕愁悲，無可如何，方自悔先時不擇地而蹈也。自強侯蒞任，大寬前政，出水火而衽席之，民間乃有生趣，巷歌戶頌，婦孺同聲。間者遇全先生妥諸人於田曰：“吾強侯富我虞人者如此，先生雖臥病，不交人事，而服田於茲，亦虞之農也。向者，虞民之苦同為受之。今茲之免且減者，不亦寬及先生之力，即願為之記，其勿辭。”餘日與農民伍，深知其事之詳。茲以食物器用之供歡騰如此，愈以信民之忠而愈以歎其苦也。使強侯即真於虞任事日久，必能為虞人籌無窮之利，於以副朝廷立法、勸農、仁民之至意。吾即於強侯今日之所為者，信之而善行前法，無使歷久滋弊，本其忠上之心，而毋自忘其苦，是又在虞民能體強侯之意也夫！

笔者认真反复学习碑文，有如下几点感受：

其一，为政之本在恤农的济世思想。

碑文对农民生活境况描绘体味深切，怀有笃厚的恤农情结。开碑第一句便是：“天下有苦无复之而仍忠于事上者，其农民哉！不知其忠，遂不知其苦，不仁之甚者也。孟子言王政，首以不夺农时，宽其徭役，使天下知农之利、农之乐，而世于以治。”大意是说，天底下最辛苦的就是农民，却还日复一日地耕耘稼穑；没有种过庄稼的人，就不知道农民的辛苦，就不太仁义了；孟子说，国家的政策首先不应该耽误农事，宽松徭役，这样才能使人们明白农业的好处和农民的快乐，国家才能得到治理。碑文又说：“……溧水强宜庵邑侯来权虞篆，下车之始，恤民力已竭，且虑历久召乱也……邑侯之心，不诚知恤农为政事之本哉？”意思是说，从江苏省溧水县来虞乡县当县令的强宜庵，上任伊始，十分体恤农民之贫穷困苦，担忧时间长了引起社会不安定……县令的心里，很清楚恤农为政事之根本呀。碑文还说：“年来岁谷不登，日循陇亩，目睹虞民卖妻鬻子，泣涕愁悲，无可如何……”意思是说，以前年景不好，收成欠佳，亲眼看到虞乡农民因生活所迫，把妻子儿女卖给别人，啼饥号寒，悲哀忧愁，没有办法。如上所述，作者以白描的手法，深切地刻画了封建社会最底层老百姓的穷困潦倒生活，在一定意义上都是恤农思想的具体反映。

其二，社情民意要顺乎的从政理念。

纵观碑文作者阎敬铭的人生历程，无论是他青少年在陕西省大荔县黄河岸边的稼穑耕种、关中书院刻苦求学时代，还是中晚年在山西省永济市中条山下的退休隐居、聚徒授经生活，他对农民生活境况体味深切，怀有笃实厚诚的恤农情结。其中，整饬吏治以恤农、社情民意要顺乎是其重要的为官理念。“……向者，虞民之苦同为受之。今兹之免且减者，不亦宽及先生之力，即愿为之记，其勿辞……”大意是说，过去很长时间里，我和老百姓一起遭到苛捐杂税盘剥，生活十分凄苦，如今享受到知县强宜庵的恩惠，老百姓就给你立碑为证，切切不要推辞。“……使强侯即真于虞任事日久，必能为虞人筹无穷之利，于以副朝廷立法、劝农、仁民之至意……”大意是说，倘若强宜庵能够长久在虞乡县担任知县的话，体察百姓穷困，顺乎社情民意，那么必定能为虞乡老百姓谋取很多很多利益，以体现朝廷公正立法、劝农稼穑和仁爱百姓的为政本意。

在碑阴处的刻文里，记载着知县强宜庵答复当地三乡绅士关于设立差务总局的批示：“……境内差务浩繁，苦乐不均，实民力有不逮也。既经众绅公议，共体时艰，以顺舆情而纾民力，仰即设里民总局，准如所禀，以为定章……”这说明了强宜庵体察民情，顺乎民意，宽纾民力，同意百姓意见，成立里民总局，并且以刻碑的形式确立下来，广而告之，体现了为官者一定要顺乎社情民意的从政理念。所以我们说，这碑文，从另一个侧面真实地反映了晚清名臣阎敬铭的民本思想和家国情怀。

其三，规章制度须遵守的为官之道。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碑文作者阎敬铭（1817-1892），素有晚清“救时宰相”之称，陕西省朝邑县赵渡镇（今陕西省大荔县朝邑镇）人，道光二十五年（1845）进士，历任山东巡抚、户部尚书、兵部尚书、军机大臣等职。他不畏强权，弹劾不法，崇廉尚俭，整顿差徭，惩贪扶正，一生为官清正廉明，深知整饬吏治以恤农是其重要的为官之道，理财尤重节流，是我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理财专家之一。慈禧太后在议修颐和园时，阎敬铭以“库银缺少，列强环伺，不宜居安妄为”为由，坚决不予开资，受到慈禧太后斥责，给予“革职留用”的处罚。在他一生短暂的从政生涯中，就曾7次被罢免官职、居京留用、返乡待用。

他忧国忧民，乐善好施，热心地方公益事业，储粮备荒为百姓，不仅捐款修建义学，而且倡导、督促在（朝邑）县城西侧（今大荔县城东17公里处的朝邑南寨子）建起“丰图义仓”。这在当时是全国唯一的民间粮仓，可储粮500万公斤被慈禧太后题赞为“天下第一仓”。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仍沿用其为粮站，如今是陕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阎敬铭的故乡与虞乡直线距离不足百里。他告老还乡后曾寓居蒲州一带的下寺村、屯里村、楼上村，最后客死楼上村。他对永济这个第二故乡充满了深厚感情，寓居期间家风严谨、和睦乡邻，聚徒授经、讲学不辍，赠人墨宝、主持公道。他1867年就任山东巡抚期间因病回乡，因家乡遭水灾而侨居山西虞乡县屯里村，当他看到当地许多“生童”无学可上，就一边调养身体，一边设馆教学。

据比他小24岁同在朝廷为官当过光绪帝师的翁同龢在《日记》里记载：阎敬铭在清廷“……11次起用，退居16年，在中条山讲学，可敬，可敬”。在楼上村，有一座不事雕琢、自然质朴的“阎家楼”，是由他的三儿子阎乃竹修建、阎敬铭和家人及其后人的居所。宅院正院门楼上题刻着由阎敬铭亲笔撰写的一副楹联：“处物要吃亏立身要吃苦；治生不求富读书不求官。”这副楹联，包含着不怕吃亏、甘于吃苦的人生理念，包含着不计较个人得失、不为功名利禄所困的旷达情怀，既是阎敬铭一生治学、为人处世的深刻体会，也蕴涵着他对子孙后代的谆谆教诲和殷切希望。100多年来，阎氏子孙们坚持和传承家风家训，勤奋努力，不怕吃亏，不怕吃苦，在各自工作领域，对国家对社会作出了应有的成绩和贡献。

为了切实保证吏治清廉，有章可循，阎敬铭在碑文中旗帜鲜明地提出：“……择其甚害者免之减之，著为定章……”大意是说，选择一些严重损害虞乡县老百姓利益的苛捐杂税项目予以减免，并且立下规章制度，严格遵守执行，可见其规章制度的重要性。在答复当地三乡绅士关于设立差务总局的批示上说：“……境内差务浩繁，苦乐不均，实民力有不逮也。……以为定章……”说明了强宜庵知县体察民情，关爱民情，严禁苛捐杂税，将其用途、次数、额度等，以规章制度形式确立下来，“……流水车马刊两连票，存署盖用图章，局中见票支应……”严格按照规定要求办理有关财务支出手续，予以公示，体现了从政者一定要遵守党纪国法和各项规章制度的为官之道。

总之，碑文既昭示了“察吏”与“恤农”在国家治理中的极端重要性与内在关联性，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阎敬铭本人内心所坚守的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延续，同时也有着十分积极的现实意义。